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与统一^{〔*〕}

张淑娟, 孙冉冉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历史方位进行全景式扫描方能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及其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其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既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是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民族以主体性并为之提供历史纵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援引资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契机,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重新书写中华民族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关系史也是重构社会集体记忆的历史过程。二者互动中在内在结构、演化历史、领导力量、服务对象和内容上实现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者于一身,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既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也决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方位;主体性;互动与统一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3.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不同于此前表述,这一表述首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独列出,由原来的一个结合转变为“两个结合”,从党

的指导思想高度进一步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将“两个结合”原则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中国疆域在确定后保持基本完整,中华民族在近代跌入低谷后又能走上复兴之路……,有一些核心要素不断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演进,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

作者简介:张淑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孙冉冉,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的阶段性成果。

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些核心要素的精神内核。

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2] 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作为民族工作主线。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培育、铸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何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者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有何启示?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有效展开,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历史方位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演进史,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历史阶段,并在近代从之前的“自在”民族发展为“自为”民族,尤其是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团结成一个整体。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使其获得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滋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目标,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中华民族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质是中华民族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层面,^[3] 是中华民族建设的核心内容。^[4]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提出,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本部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时空定位等几个方面,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价值所在。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不仅是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基于复杂的国际背景。

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整个世界已紧密联系在一起,欧美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构建的西方文明及其所形成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披着“普世”的外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不仅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给各国文化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采取一系列逆全球化行动,如退出多边国际组织、打贸易战、英国脱欧、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延续“冷战”思维的种种行径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各国间以民族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述两方面都对各国的社会动员、政治团结和力量凝聚提出了挑战。

从国内环境看,任何思想的提出都依托于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产生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也不例外。在经济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5]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温饱问题,而且逐步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新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在思想文化上,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培育和践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者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和提升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与突破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现实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从中共二大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6]到《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7]再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8]的号召,致力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方向与目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9]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012年至2019年,民族地区累计减贫25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1%下降到4%。^[10]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所指出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11]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极大的胜利。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应正视所面临的挑战:在境外反对势力的长期蛊惑下,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的斗争异常激烈。“三股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给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带来极大挑战。因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基础、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国内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制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也不同程度存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经过几千年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在内在情感上的积极反映,也是为应对上述风险与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新的历史方位需要一种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回应上述需要提出的原创性思想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全面回归与充分彰显。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与时空定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新中国提供了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原则,确立了“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构成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民族政策的基本支撑,从根本上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和框架。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2]各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其中所强调的“中国”认同及“大一统”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发提供了基本的思想遵循,而“天下观”的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理念则为其提供了多元共生的价值与伦理基因。三是西方经典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本土化。“国族一体”的政治理念及其所包含的价值预设,从理论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划定外在边界。

首先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提出的思想来源之一,而非全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反映,是内生于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内聚性情

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历史上，中国疆域内各民族经济上紧密联系，无论农耕、游牧亦或渔猎，在碰撞与交融中共存于统一的“天下”之内；政治上，一方面崇尚“春秋大一统”，^[13]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致力于实现统一，将“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遐迩一体，中外禔福”^[14]作为崇高追求，消灭疆域内所有割据政权实现政治“大一统”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包含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在内的大多数封建王朝时期中国处于大一统状态，统一时长远超分裂时长，政治上统一的追求已刻入民族基因；文化上，中国境内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互鉴互融，既有游牧民族汉化的鲜卑魏孝文帝改革，也有农耕民族借鉴匈奴文明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更有契丹辽“南北面”制的共存共处，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益与命运上，各民族更是荣辱与共，共同经历了强汉盛唐的辉煌，也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具有“全民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属性。^[15]正因一系列因素的凝聚与形塑，中华民族才能够熔铸成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累积下来的精神财富，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和身份标识。另外，除了古代史上历代政权的“万里车书一混同”，还有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共同走过的历程和丰富实践，融汇成而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有两条线，一条是明线，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其产生的相应时空之中，而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近代

以来的文化“过滤”和选择，在新时代孕育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与新时代之间有巨大的时间跨度，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营养。一条是暗线，作为已经融入到民族血液内化为民族基因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等外来理论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中唯一一以贯之的文化，这一文化凝聚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涵养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了民族风俗传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都是这一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大一统”理念的现代延续，其产生、确立和发展都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及演进逻辑

“文化”一词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词义演变，^[16]学术界对其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包含人类所有创造活动过程及成果，是“人对自然的加工”。^[17]学术界普遍将其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18]狭义的文化仅指其中的精神层面，同时是不可分割的“复合的整体”（complex whole）。^[19]本文在精神层面使用文化一词，同时包含附着在物质之上的人类意志与精神。因此，“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20]是一定人群成长的精神印记，是其精神和身份标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纵向结构

中华民族在演进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必然形成与之对应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身份标志，中华民族演进历史中所累积的全部精神文化成果可统称为中华文化。

按照纵向划分，中华文化可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史上汇聚而成，凸显着中华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烙印。其中，优秀传统文化

化是中华文化的逻辑起点,一方面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应,植根于各民族几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总体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从农业社会孕育而来,二者具有发生学的内在关联,如“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21]充分显示了农耕文明的德性至上、崇礼亲仁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既定地域相关联,虽然在民族国家到来之前,传统社会没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主权原则领土化即领土性国家主宰的语境下讨论传统文化,必然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界,文化的边界直接决定于领土的边界。在中国疆域内的所有优秀文化都应该纳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内,不应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窄化为汉文化,也不应该将各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更不应该将强调各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共同性视为民族同化。正如有学者指出,“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该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22]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边界也应该遵从这一基本原则,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历史上所有民族共同创造并累积而成的。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横向结构

从横向上看,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会有不同的理解。由内而外进行划分,可分为社会心理、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呈现形式等。按照不同领域可分为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按照生产生活方式可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海洋文化等。按照我国的民族构成,可分成不同民族的文化。按照民族构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结构进行划分只是我们对其进行把握和研究的方法之一。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本文主要是按照民族构成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在结构进行讨论,中华民族是复合民族,即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众多单一民族的集合体,^[23]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在不同时期都由不同的民族单元构成,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24]格局,“多怎能合成一呢?其中必须有一个组织,就是各部分在一体中有规定的相对地位,按照一定方式活动,多组织成一就成了一个体系。”^[2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构成相对应,都是由中国疆域内所有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历史上汉族创造的文化,也涵盖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民族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2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超越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和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2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简单相加,其蕴含了超越各民族单元文化的“整体性”,“是被各族人民共同传承和弘扬的精神基因,是各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依托,各民族文化只能依存于中华文化。”^[2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普遍性,彰显着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性。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进逻辑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合性不仅指民族族体构成意义上的复合性,还指在内涵上的复合性。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演进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围绕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内核与时俱进、兼收并蓄。从历时性角度，中华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政治条件的转变而向前演进。以儒家文化为例，由孔子的早期儒学到战国的思孟学派，由汉武帝时董仲舒杂糅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融汇成的“外儒内法”到隋唐的“三教合一”，由崇尚天理的宋明理学到知行合一的陆王心学，儒家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呈现出新的特质；从共时性角度，同一历史时期内中华文化对外也是开放的，不断有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与原有思想交融汇合并融入各民族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弥合各民族之间“缝隙”的黏合剂，形成具有新要素的共同文化，如汉唐丝绸之路将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服饰、饮食、宗教、典籍等传入中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华民族所吸纳，其精华部分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伴随中华民族复合性的演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更深厚、生命力更顽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进是一个整体性不断强化、共同性不断增加、密度不断夯实的过程，这一演化逻辑以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为依据。随着各民族在实践中交往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多”的主体地位逐渐为“一”的主体性地位所取代，从春秋时期的“华夷有别”到明朝的“君主华夷”，各民族单元创造的文化日趋融为统一的文化板块，在历史演化中中华文化超越于民族单元文化之上的整体性得以不断强化；各民族文化在保持其特殊性的基础上逐渐趋向于共同性，“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31]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发展中与时俱进，博采众长，汲取其他文明成果进而在内容上更为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上述逻辑演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转化奠定了文化基石。如对统一的信仰，在继承和建构中交错推进，在自然交往与国家意志互动中发展。“大一统”思想，其意为“以一统为大”，起初含义为历法上的时间

起始标准。随后渐次扩展到政权统一、经济统一、民族统一、思想文化统一等诸多层面，从度量衡统一、疆域统一到政治的君主集权，从华夷之别到华夏认同的文化一统，直至意识形态的尊重正统，无不以一统为大。“大一统”理念造就了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反映的对象恰恰是这一伟大的民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大一统”理念在新时代的集中呈现，是“大一统”理念的时代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双向性

“两个结合”的提出为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想象空间，本部分就二者关系进行简要论述。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援引资源与历史纵深

人类生存繁衍会产生多种需要，而文化是人的需要^[32]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同时在漫长生计中累积下来的文化规定性对人的行为选择、价值观的形成又会产生深刻影响，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文化的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蕴含着和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和合理性所在。”^[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时代精华，同时又内在地规定了其后续的演进逻辑，为其发展提供“人文世界”，使中华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内在逻辑和发展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底色，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直接援引的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总结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

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生动实践所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性品质,特别是追求团结统一的精神气质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大一统”政治理念和“中国”认同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推崇,成为他们“逐鹿中原”并确立正统的内生动力;“尚和合”的文化传统进而“因俗而治”的政治理念作为封建王朝维系多民族统治的核心思想,有力推动中华民族栖息之地不断巩固和拓展,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35]实现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6]的开放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汲取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尤为难得的是,中华民族有延续三千多年的修史传统,早在西周时便有官方设立的专职修史官——太史,历代统治者亦极为重视官修史,不仅延续修撰了被确立为正史的二十四史,^[37]还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如《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此外,民间亦有修史传统,传承下了《春秋》《战国策》《十六国春秋》等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将中华民族历史串联起来,勾勒了上迄三皇,下启当今的五千年历史。在中国,历史有着宗教般神圣的地位,中华民族的生命在历史文化中得到滋润和确证。丰富的历史资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援引资源,考古发现则从更客观的角度为其提供直接证据,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丰富的考古发现为“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证明,超越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的“三要素”说,即城市、金属和文字的标准,提出了关于文明的“中国方案”。上述种种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援引的丰富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适应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的内聚性情感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营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起点的多源性和构成结构的复合性来源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同时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之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逐渐形成一体,因而文化上的结构是由民族实体的结构所决定,并反映这一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自的内在结构皆由上述族体结构所反映。

作为一种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根基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3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萌生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奋斗史之中,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要在新时代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来理解和把握,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标识中的作用,也才能站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立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表述。^[39]毛泽东的讲话处处彰显着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观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载体之一,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援引资源与历史纵深。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构提供了历史契机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在于将革命叙事重新转变为民族叙事。革命必然引发一定程度的断裂和不连贯,就中国近代革命史而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尖锐的反传统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曾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布,甚至出现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过激主张;进入新民

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经历由“国际主义”向“爱国主义”的转变,在实践中逐渐统筹革命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关系,接受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叙事将中华民族的历史连贯起来并形成整体,进而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素材和历史纵深,同时民族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具有一致性,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而今日的中华民族亦非那个“家国一体”的自在民族,而是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朝气蓬勃的现代民族,因此党的十八大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列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40]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参与式的把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体会,即从亲历者的视角去感知,通过“沉浸”方式去体验这份文化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我们的血液,浇铸成为思想观念、民族精神、道德规范,传统文化不是外在于我们,而是存在于人们自身,潜移默化地融汇在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生产生活之中,只是绝大多数已经“日用而不知”,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某种呈现。另一种是依现实需要,基于当下的视角将传统文化视为“他者”,回到传统文化的原典,运用当下的立场与方法重新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发掘、梳理与重构,探究中华民族起源、发展的脉络,在新时代重新抒写中华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构提供了历史契机,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在其培育与铸牢过程中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华民族元素,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资源,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观念、人文情怀和道德规范。同时,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文化成果又发轫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在新时代对其汲取运用还须结合

时代要求进行继承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源泉。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即是中华民族这一古老民族迈向现代社会、实现伟大复兴道路上致力于提升族体凝聚力、适应时代变迁的重要努力,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进而积攒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渠道,为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和策略提供“现代化”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41]当前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契机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促进其“两创”目标的实现,重新认识此前学术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进行补充完善,并重新定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学者将不同文化传统中思想之间的精神契合、诠释与发明称为“会通”,^[42]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重新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目前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43]尚未将“大一统”理念纳入其中,但这一理念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千年传承的重要文化理念,历代政权无不受文化上“大一统”影响而致力于政治上“大一统”。同时“大一统”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来源,应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反过来进一步补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并以此为契机激活优秀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拾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都是重构社会集体记忆的过程,两者分别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两个视角反观对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理论基石。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并非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直接相关,而其中的一部分,诸如“大一统”、“中国”认同、“因俗而治”等理念显然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中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补苴其研究与发掘工作上的缺位亦十分重要。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动中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文化累积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发展到新时代对自身主体性的进一步确认,两者互动中在内在结构、演化历史、领导力量、服务对象和内容等方面高度统一。

内在结构上的统一。各民族单元在中国疆域内交往交流交融逐渐熔铸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演化中全部精神文化产品的优秀部分,其生产主体正是各民族单元。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对主权疆域内中华民族实体的现实表达与引领,不仅包含当下中国境内各民族,也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统一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也形成了与这一实体结构相一致的文化结构。

演化历史上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演化历史具有高度统一性,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起伏而延绵延续,随盛唐“天可汗”的强烈认同而呈现胡汉交融、中西贯通之繁荣,又因近代中华民族的衰弱而沉沦,甚至在清末民初“全盘西化”思潮下险为西方文化所倾覆,继而随中华民族建设的推进而逐渐恢复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回应形势呼唤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民族叙事重新成为演绎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得以重新确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提上日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重焕生机。

领导力量上的统一。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44]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45]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者,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工作甚至全部工作的“纲”。中华民族在农耕时代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主体,是两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服务对象上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进一步推进从“王朝国家”时代走出的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结构、民族凝聚、民族动员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亦能为实现其伟大复兴任务奠定更为稳固的族体结构,为其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凝聚力量、汇聚民心。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发掘其中“天下为公”“道法自然”等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相适应的成分,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养料;另一方面传承其“时和岁稔”“天下大同”的价值遵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滋养。

内容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自然也是“大一统”理念的继承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是文化自信的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大一统”等理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援引资源与历史纵深,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判断传统文化中哪些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价值进行择取,也要遵从时代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一是符合人类普遍认可的“真善美”的价值标准,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持续发展、和平共处的思想与行动,总之是对人类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精神力量;三是为今天的时代发展所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时代需求,彰显时代价值。具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主张族际和谐包容、体现家国情怀等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文化都是与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化。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谨慎细致的甄别筛选,才能区别出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同时对精华部分进一步选择,甄选出其中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标相一致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具有内容上的高度统一性。

四、结 语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高度重视文化在方向指引、力量凝聚、政治团结中的作用,自身就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立场、观点和原则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为了动员全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运用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爱国主义元素动员群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6]这一论断从整体上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并指出了对传统文化优劣的判断标准和原则。“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

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47]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方式的转变——从革命叙事转变为民族叙事——相一致,从注重文化的阶级性、时代性逐渐转变为关注其继承性和民族性。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传统文化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正面肯定儒学的价值,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具体要求。显然,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置身其外,而是置身其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8]在新时代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定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新评估和再出发。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态度与民族叙事相一致,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相一致,对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越强调越重视,民族的主体性越强烈。

注释: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299页。

[3] 张淑娟:《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回溯》,《学术界》2019年第9期。

[4] 王希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建设实践及理论创新》,《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5][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6、36页。

[6][7][8]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548、1290页。

[10][11][26][3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5、7页。

[12]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6页。

[13][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18页。

[14][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5页。

[15]沈桂萍:《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西比较的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0期。

[16][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47-155页。

[17]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18]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分成四个领域: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9页)。费孝通在其基础上提出“文化”(广义的)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生活的工具……这是器物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层次……包含这个社会里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第三个层次是包含一个价值观念的层次(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16-19页)。庞朴提出了文化分为“物”“物心结合”和“心”三个层面(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这里所指的“文化”是马林诺夫斯基所指的精神文化和语言、费孝通所指文化的第三个层次和庞朴所指的“心”的部分。也有学者将文化分为观念、活动和客观性成果三个部分(魏光奇:《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序论”,第1页)。

[19][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0][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21]宋祚胤校注:《周易》,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41页。

[22]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

[23]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2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结构的概括,其中“多元”指56个民族,“一体”指中华民族。参见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30多年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在决策层面得到肯定和应用。参见王希恩:《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多元一体主义的思考》,《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

年第8期;周平:《中华民族:一体化还是多元化?》,《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等等。

[25]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27]张淑娟:《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

[28]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年,第75页。

[2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30]《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31]杨一凡主编:《中国律学文献》第2辑第1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32]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基本(生物)、派生(社会)、整合(精神)三个层次。参见[英]B·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121页。

[33]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6]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37]二十四史为清高宗“钦定”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今天加上《清史》则为二十五史。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42]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0页。

[43]张岂之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

[44]《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8页。

[46][4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707-708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